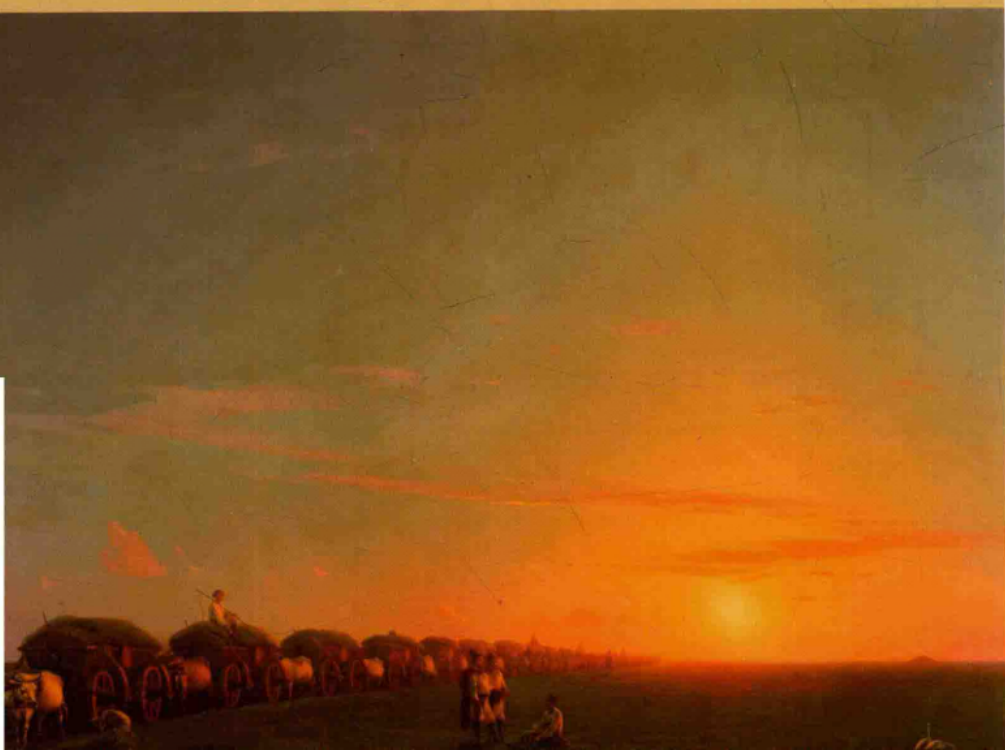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
总主编 何成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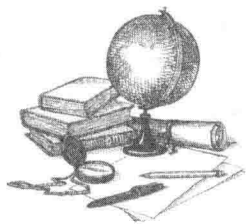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 经济与社会生活

主 编 刘汝明 赵文龙 何成刚



復旦大學出版社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

总主编 何成刚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 经济与社会生活

主 编 刘汝明 赵文龙 何成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 经济与社会生活/刘汝明,赵文龙,何成刚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0(2019. 3 重印)
ISBN 978-7-309-13945-7

I. ①历... II. ①刘...②赵...③何... III. ①中学历史课-教学研究-高中
IV. ①G633. 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5963 号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经济与社会生活
刘汝明 赵文龙 何成刚 主编
责任编辑/朱建宝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 字数 473 千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945-7/G·1899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是“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中的一册。“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是高中历史教师准确把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进行基于历史课标的教学的专业发展丛书。

本丛书根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的单元学习主题，从“学术引领”“教学设计”“教学资源”三个角度，借助学术界的权威研究成果，为高中历史教师开展基于历史课标的史料教学，提供高质量的、系统整体的资源支持；引导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识到，史学阅读是历史教学的起点，史学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决定历史教师史学素养的发展程度，决定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质量，切实推动形成重视史学阅读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

本丛书也可供初中历史教师阅读，为初中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总序

毫不夸张地说,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可谓层出不穷,颇有些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呈现出了多元丰富的特点。通过阅读《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期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无疑反映了历史教育发展进步的一面,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在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看来,听起来虽然很好,但如何在实践中与具体教学内容实现有机融合,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也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十多年来,历史课堂难以发生本质变化或者说变化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显著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与教学实践不能实现有机融合,固然与一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有关,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处于一个浅层水平,没有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由此导致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与“教学实践”形成“两层皮”现象。

可见,要推动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质的飞跃,不能没有“主义”(即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的引领,但是,仅靠“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的教学内容,绝无可能完全相同,有的看似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具体的教学内容,必须达到深度把握、准确理解的程度。如何做到?实践证明,除了史学阅读,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无疑是当下历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种“主义”。与“三维目标”相比,“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更加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在准确把握历史学科本质、历史学科思想、历史学科方法和深度理解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教学。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当我们站在课堂上,自然会有充足的教学底气和勇气。试想,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如果自身对“历史核心素养”中强调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缺乏准确把握的话,如果对教学内容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肯定容易流于形式。

可见,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关键在于提高历史教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理解水平,关键在于促进历史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把握,这恰恰就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最突

出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学历史教师其实并不缺“主义”的引领,最缺的恰恰就是与《历史课程标准》对教学基本要求相一致的高质量的史学成果与史料资源。

为此,我们围绕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单元学习主题内容,组织北京市、安徽省、江苏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四川省等地的历史教学专家、优秀教研员、优秀教师,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了一年多的广泛而又有深度的阅读。在阅读中,注重核心阅读、群文阅读、比较阅读,以确保阅读的专业性和综合性,保证阅读的品质。在此基础上,一是精选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历史教师比较全面地了解史学研究成果,促进历史教师在史学阅读中提高对历史核心素养的理解水平,在史学阅读中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引导历史教师从多个方面深度把握历史教学内容;二是搜集整理有价值的教学资源,特别是史料资源,旨在为中学历史教师提供日常备课可用的素材,让广大历史教师一看就明白,拿来就会用,从根本上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实际问题;三是围绕历史核心教学内容,以《历史课程标准》强调的“史料研习”理念为指导,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教学设计的探索,强调将历史学科本质、历史学科思想、历史学科方法融入历史教学之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可以说,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团队多年来一贯坚持的根本理念。

总而言之,我们从事本项研究,一方面在于从阅读权威史学成果、合理运用史学资源入手,为中学历史教师深入理解《历史课程标准》,开展基于《历史课程标准》的史料教学,扎扎实实地将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落实在每一节历史课中,提供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的、系统整体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旨在倡导重视史学阅读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引导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识到,史学阅读是历史教学的起点,史学阅读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决定历史教师史学素养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和质量。

或许这样的教学研究并不十分地“高大上”,但对于促进历史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历史教学质量,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接地气的“基础工程”。虽然繁重且浩大,但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我们坚信,这样的教学研究,有利于在根本上推动“主义”从“浮在空中”顺利“落地”,推动“实践”从“形式”走向“卓越”。

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我们心怀美好愿望、秉持专业态度、发扬协作精神、遵循学术规范、克服种种困难,编写了这套丛书,希望为中学历史教学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更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何成刚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目 录

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1
学术引领	1
教学设计	44
设计一：传递甜蜜——近代前期蔗糖的传播及影响	44
设计二：如何养活我们？——认识现代农业	46
教学资源	50
第二单元 劳动工具与劳作方式	60
学术引领	60
教学设计	103
设计一：农具之尊——古代中国耕犁的演进	103
设计二：工业革命的关键——机器在棉纺织领域中的使用	107
教学资源	109
第三单元 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114
学术引领	114
教学设计	153
设计一：茶事物语——小植物的大历史(国内贸易)	153
设计二：茶事物语——小植物的大历史(国际贸易)	157
教学资源	160
第四单元 村落、城镇与居住环境	165
学术引领	165
教学设计	210

设计一：影响居住的因素	210
设计二：古代城和市	214
教学资源	216
第五单元 交通与社会变迁	222
学术引领	222
教学设计	262
设计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火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262
设计二：天涯若比邻——中国近代通讯变迁	266
教学资源	269
第六单元 医疗与公共卫生	275
学术引领	275
教学设计	312
设计一：死神的胜利——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阴霾	312
设计二：梁启超的割肾医案——近代中西医之争	316
教学资源	319
后记	326

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学术引领

一、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的演变及意义

(一) 早期人类的食物采集

1. 食物采集与早期人类的生活

(1) 食物采集的历史占据人类绝大部分时间

李根蟠在《中国古代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页)一书中认为,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内以采集渔猎为生。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是从种植业和养畜业的发明开始的,它只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

史密斯在《农业起源与人类历史——食物生产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玉美等译,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在食物生产出现以前,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从自然中攫取食物,对自然状态并没有多少改变。而食物生产导致了社会分工形态的变化,为阶级产生奠定了基础,铺平了向国家发展的道路。

崔明昆在《论狩猎采集文化的生态适应》(载《思想战线》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约90%的时间一直以小规模狩猎采集群体而存在。据推测,公元前10000年左右,世界人口约1000万,全部为狩猎采集者。到1500年左右,世界人口增加至3.5亿,狩猎采集人口仅占10%,主要集中在北美、南美南部、澳大利亚、非洲南部、西伯利亚东北部以及东南亚。1960年,世界人口增至30亿,狩猎采集人口所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至0.001%,呈星点状分布于热带亚洲、非洲及北美洲等少数地区。已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80亿人口中,约90%的人以狩猎采集为生,6%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4%的人生活于工业社会。

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杨雅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页)一书中认为,对于一直以狩猎为基础,过着游牧生活的人类而言,农牧的产生是一场重大的变革。若将现代人出现以来的15万年比作一小时,那么直到最后四分半钟,人类才开始实行农牧,直到最后一分半钟,农业生产才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人类从四处搜寻食物到农耕养殖,从自然获取食物到运用技术的转变,是近期且突然出现的现象。

梅尔文·恩泊和卡罗·R.恩泊在《获取食物》(彭景元译,载厦门博物馆编:《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与我们当今社会相反,大多数时期人类并没有专业的食物生产者。大多数成年人都在从事获取食物的活动。人类生存在地球上90%的时间是通过采集野生植物、狩猎、捕捞的手段获取食物。农业生产食物出现在距今10 000年前,而工业性或机械化的农业则不足百年。

(2) 人类自身的适应性与早期食物采集

陈胜前在《史前人类的狩猎》(载《化石》200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人类一直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适应策略,表明人类适应能力的增强,人类能够控制更多的资源,也表明人类逐步走到了生态食物链的顶端。对于人类祖先而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食物,次之是配偶。他们必须流动,他们在流动之中获取食物,同时收集以后可以食用的食物的信息,并且在流动之中结识其他的群体,找到自己的配偶。这种流动经济的成本使他们不大可能随身携带很多东西,比如工具和两个以上需要背负或者怀抱的婴儿。陈胜前在文中介绍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时指出,早期直立人消耗肉食对他们的身体和认知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成为高效的猎人以及食腐者,并带着这样的饮食知识从非洲向外迁徙。早期直立人已经能够用火烹饪食物,增加了食物的营养价值,促进了人类的消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化进程中生理和神经系统的发展。在这段时期人类是猎人和采集者,他们以丰富的野生植物和昆虫为食,并设置陷阱捕获小动物及鱼类。人类建立群体关系后开始狩猎大型哺乳动物并习得有效的狩猎技巧。尽管大自然对于这个时期的人类是慷慨的,人口数量并没有突破发展,一直保持稳定。

彭纳在《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张新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8页)一书中指出,气候变化和人类自身的适应性促进了人类心智的发展,这在人类智慧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伴随着经验和自然选择压力的增长以及大脑智力的进化,由于人际关联、种群规模为种群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保护,原始人群的活动范围得以增大。他们不断提高的智力水平使他们不断应对险恶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即是狩猎者,也是被猎杀者。

(3) 食物采集时期的人类生活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农业的起源与传播》(李群译,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虽然已学会了说话,制造工具和利用火。这对于他们战胜其他动物有了很大的帮助。然而,在基本的方面,人仍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是食肉动物中的一员,也是食物采集者,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由于在一个地区,他们寻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充分满足生活,他们不得不分成小群或小队生活。据估计,即使是在肥沃的地区,在和暖的冬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最多只能维持一二个食物采集者的生活。而在寒冷地区,或热带丛林、沙漠地区,则每个食物采集者需要二十甚至三十平方英里的土地才能维持生活。

崔明昆在《论狩猎采集文化的生态适应》(载《思想战线》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食物资源的波动性决定了狩猎采集民族群体的小规模性、迁徙的频繁性。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狩猎采集群体规模平均25—50人,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追踪猎物而迁徙。

施鼎钧在《辉煌的中国渔业史》(载《北京水产》1999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在原始社会,

生产力低下,人类为寻找食物而奔波。狩猎和采集不足以维持生活,人类开始把生产活动从陆地扩展至水域,利用水生动植物作食物,出现原始的捕捞活动。据1933—1934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考古发掘证明,18 000年前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其谋生手段,除采集植物和猎取野兽外,还在附近的池沼里采捕鱼类和贝类。在山顶洞人遗址内,有一块钻有小孔并涂了红色的草鱼上眶骨,那是他们将鱼食用后留作装饰品的明证。据推算,这条草鱼约有80厘米长。这说明,水产品已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尚定周、王友文在《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试论农业的起源》(载《世界农业》1983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以后,仍因袭了动物的一些习性,像其他动物一样地从自然界觅取食料,并保持着杂食性的生活习惯,既吃植物,又吃其他动物。在尚未学会生产食品的情况下,植物类靠采集,动物类靠渔猎,从大自然宝库中取得。

傅稻镰在《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西亚和北美东部的个案分析》(秦岭译,载《古代文明》2005年辑刊)一文中指出,在农业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狩猎采集经济,人们依靠每年特定时期内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为生。在大部分情况下,狩猎采集社会都是流动的——至少流动性是应付季节性短缺的一种必要策略。

2. 食物采集对食物生产出现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卡博在《食物生产经济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早在15 000年前,或许更早,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就已熟悉了植物和动物的周期性生活,并细致地观察到这种规律。这就对农业与动物驯养业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准备。

尚定周、王有文在《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试论农业的起源》(载《世界农业》1983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采猎种类的确定,开始是盲目的。人类经长期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有选择地取食于自然。采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上千种的植物慢慢缩小到为数不多的易得、好吃、无毒的野果、橡栗等木本植物和一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由于冰川全盛期造成植物区系的变更以及其他原因,木本植物减少,禾谷类等草本植物扩大,于是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种子逐渐上升到重要地位。这是采集业向种植业过渡的重要环节。随着猎取手段的进步,猎取野生的狗、羊、猪、马、牛等大动物逐渐上升到重要地位。这是渔猎业向饲养业过渡的重要环节。供原始人类取食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食物构成调整之后,以禾谷类为主的植物资源和以食草类为主的大动物资源,是后来选择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物质基础。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中指出,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中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中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

尚定周、王有文在《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载《世界农业》1983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原始人类由于采猎和自卫的需要,学会了使用工具。采猎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不仅扩大了采猎的食物来源,而且为日后的种植业准备了生产手段。当时的采猎工具,后来有的兼用于农耕,如石斧、木矛等,有的发展为专门的农具,如木矛改进为耒、耜。农业

的萌芽,距今虽不过一万年之久,比起整个人类历史非常短促,但农业作为采集、渔猎发展转化的结果,和采集渔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的孕育,甚至可以追溯到整个采猎时期。原始人的生活和他们采猎的工具等各个方面,以及合适的自然环境,都包含了日后农业得以萌芽的各种因素。

(二) 从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过渡

史密斯在《农业起源与人类历史——食物生产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玉美等译,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默多克对食物生产社会的界定:一个社会所提供的全部食物中,如果有半数以上的食物来自农耕加畜牧,或只是农耕,或只是畜牧,那么这个社会就可称为“食物生产社会”。利德等则认为,假设食物生产社会中能够生产一定程度的有效的食物是一种必然的状况,那么食物生产社会的标准应有两个:至少在一年中的一定时期,其共同体所需要的食物中有半数左右是通过直接生产获得的;栽培、家畜化的动植物,严格地讲,不能再返回到自然生息地和野生生物群系中。

人类从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过渡,学术研究提出的如下观点可供参考。

1. 广谱革命与广谱经济

潘艳、陈淳在《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载《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一文中梳理了“广谱革命”的相关研究: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认为距今20 000—10 000年间,特别是大约距今10 000年前,在环境和人口的双重压力下,局部的人地关系失衡导致了食物短缺和人类营生方式的转变,人类不得不利用许多以前并不利用的物种,比如小型哺乳动物、鱼、蟹、龟、蜗牛、鹤鹑、水禽、贝类以及野生禾本科的种子,它们在遗址中出现的频率和数量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大型食物向小型食物转变过程,还体现了人类开拓的食物资源种类从比较狭窄向较为宽泛范围转变的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大量新的捕猎工具和食物加工工具的发明。人类这一觅食范围及开拓技术转变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广谱革命”。它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土地载能,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压力,并成为农业起源的先决条件。冰川期后期环境巨变,打乱了人类生存的食物链,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就是在这样一种广谱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

柯济在《我古生物学家揭秘广谱革命》(载《光明日报》2012年2月14日第12版)一文中指出,随着新发现不断增多,广谱革命可能发生的时间被提前至末次冰川期最盛期来临之前,即距今23 000年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广谱革命不是简单的一次性事件,而是时间跨度长达数万年的复杂过程,并发生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推动了史前人类对野生植物的开发与利用,最终将植物种植行为推向了历史舞台。

裴安平在《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载《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广谱经济并非终止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变的过渡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广谱经济的支持下,出现了水稻的驯化与栽培,从而标志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就经济的本身而言,当时的水稻驯化与栽培还只是广谱经济的附庸,还没有显示出已成为一种产业的迹象。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量实物遗存的发现证明,稻作已发展为明显具有普及性和规模收成的农业;但相对广谱经济而言,稻作还不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还只是广谱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因为,这一时期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还

相对宽松,人类对于农业规模的扩大完全是顺其自然。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与土地,人与自然食物资源之间矛盾的激化,人们不断地改变生产方式,既精耕细作又不断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稻作开始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2. 低水平食物生产

布鲁斯·史密斯在《低水平食物生产》(陈航等译,载《南方文物》2013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人类从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转变成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等生产食物,各地条件不同,出现时间也有差异。但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转变过程极为复杂多样。人类行为表现为从被动适应逐渐向主动干预的转变。史密斯认为,农业起源探究不应只限于判断驯化物种何时出现,或根据驯化物种与野生物种的比例来分辨究竟属于狩猎采集还是农业,而是要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对环境 and 物种进行操控和管理行为的多样性。为此,史密斯用“低水平食物生产”强调人类行为在判断社群生计经济性质中的核心作用,把传统上流于注重物质表象的推断引向通过物见人的生态学视角,深化了人们对原始农业产生之前食物生产的认识。

布鲁斯·史密斯认为,无论动植物是否已经被驯化,只要人类开始有意管理它们,干预其自然的生长周期,这就是从事生产活动,这种生计形态就是食物生产经济。人类早期的食物生产毫无例外都是低水平的。史密斯指出,只要生产食物的热量不超过一个社群年摄取热量的30%—50%,这种食物生产经济就是低水平的。从事低水平食物生产的社群,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渔猎和采集的食物维持生存。布鲁斯·史密斯将不同社会形态的低水平食物生产分为两大类:一为没有驯化动植物的生产经济,另一类是有驯化动植物的生产经济。这类社会与完全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不同,同时也与完全依靠农业为生的社会不同。根据这一标准,布鲁斯·史密斯对全球主要文明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布鲁斯·史密斯估计在近东地区的文明低水平生产持续了约3000年,墨西哥瓦哈卡则有5500年之久,北美东部则持续了约4000年,在欧洲也持续了4000余年。

焦天龙在《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一文中认为,“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这一概念打破了传统上把狩猎采集社会和农业社会截然分开的概念系统,同时也表明这种生产经济绝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相反,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这种低水平的食物生产方式持续了数千年的时间,表明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济适应模式。在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社群面临的环境、社会 and 文化的挑战是不同的,但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是他们选择的共同的适应模式。这种生产模式是这些史前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不同地区社会演化的过程造成了重大影响。

(三) 原始农业的兴起及意义

1. 原始农业兴起与环境变化

米切尔·乔奇姆在《从猎人到农夫——21世纪农业考古展望》(蒋乐平译,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农业的产生与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如海岸线、

河湖位置、森林界线的变迁。同时我们还发现,动植物的驯化试验在更早的时候就在不少地方进行了,且其实验的动植物品种的数量上尤其超出我们的想象。

胡效月、安成邦在《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综述》(载《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更新世晚期,地球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一部分物种消亡,人类在采集水果、浆果,猎取飞禽走兽、鱼虾不能果腹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利用植物的块茎、草本植物的种子,这是农业起源包括稻作农业起源的动因。

徐旺生在《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载《中国农史》199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距今约12 000~10 000年,由于气候的波动,造成中国动植物资源巨大变化。动物的减少,尤其是各种易猎可食动物的大幅减少,使中国南北两地的居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这一阶段一开始的急剧升温及以后的渐趋稳定,为谷物驯化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南北两地几乎同时进入了原始栽培农业的诞生阶段。

徐旺生还在《农业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载《古今农业》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了环境与农业出现的关系,他认为农业(确切地说是农耕和畜牧)是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地域内才能产生,其特定条件是:更新世冰期的影响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强则使人类无法生存,如欧洲北部及美洲北部地区,在更新世冰川期中,欧洲的冰川中心在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由此向东、南和西南方向推进,掩盖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大陆冰川。由于大陆冰川的存在,土地被冰川覆盖,种植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欧洲中部及北部地区未能孕育农耕;美洲北部的情形和欧洲北部的情形一样,当时的威斯康星冰川期发育,平均气温比现在低 $13^{\circ}\text{C}\sim 15^{\circ}\text{C}$,且北部主要是平原,地表被冰原覆盖,人类无法生存,农耕和畜牧也就无法产生。大洋洲、太平洋诸岛及南部非洲等地的人们在外部势力未进入以前,依然过着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活。因此,农耕的产生只能在特定的地域——第四纪冰川期影响适度的地球中纬度地区,这一地区包括西亚两河流域、南美安第斯山地区、黄河及长江流域。这里的冰川期作用适度,既导致人类食物来源减少,同时又没有欧美北部那样的严寒而使人类不能生存。这里的人们在食物相对多一些的季节采集一些食物以备乏食季节需要的过程中,对植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又在贮藏过程中将食物尝试种植,从而萌发了农业行为。待到冰期结束以后,由于食物相对充裕,因此他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将贮藏的种子用于种植,将一时吃不掉的野兽尤其是幼小的草食及杂食动物的拘系起来。当这种种植和拘系过程持续进行后,植物种子和动物分别发生了变化。植物种子主要因为贮藏而发生理化特征的变化,贮藏的种子因脱离了原先被土壤覆盖的保暖湿润环境,而处于干燥裸露的环境,再行撒落入土种植,其发芽状况与自然撒落自行发芽大不一样;动物通过拘系以后则主要表现在性情方面发生变化,一些草食动物,如牛、羊相对来说性情较温顺,它们就成为家养动物了,农耕和畜牧随之产生。

2. 原始农业兴起与人口压力

马克·纳森·柯恩在《人口压力与农业起源》(王利华译,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人口压力是原始农业发生、发展的原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为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

贾里德·戴蒙德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高星译,载《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冰川期时代末,当人口密度缓慢上升之时,各人群不得不转向农业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与寻找办法控制人口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一些人群选择了前者。他们没有意识到农业的危害,反而受到这种暂时富裕享乐的诱惑,直到人口的增长与食物的增加相抵消。

吴小平、王伟宏在《论我国史前时期的人口压力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通过对原始遗址遗存的研究证明,晚更新世时期由于末次冰川期的作用,人口压力普遍出现,在两河流域和中国黄河及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率先出现,从而为两地古典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3. 原始农业起源与定居生活

尚定周、王有文在《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试论农业的起源》(载《世界农业》1983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原始人类很长时间内过着流动生活,迁徙无常。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逐步摆脱了穴居野外的生活,走向广阔的地域,建造起简陋的野营住地。原始农业遗址的地下发掘材料表明,人类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日益普遍,定居的时间也愈来愈长。定居生活代替了流动生活,人类就有可能对周围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所了解,也有可能把捕到的活动物看管起来。这正是人们学会种植和饲养的必经环节。定居使种植与饲养成为可能,导致农业的产生,而农业的产生更进一步促进了定居的巩固和发展。

森本和男在《农耕起源论谱系》(宋小凡译,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一文中强调,农业一直被当作定居生活的必要条件。对人来说,流浪生活不值得效法,农业的发明与定居生活使人口增加,由此才开辟了通往文明的道路等,这些都是19世纪的学者们的想法。但是在现代正进行着狩猎采集活动的流浪性民族看来,定居才是真正的疯狂。他们的行动半径宏大,总是带着大量新鲜而且详细的信息。他们不是为了获取食物而到处流动,而是为了选择四散各处的食物源,也就是说将食物匮乏的危险分散开来。的确,定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与此同时,由于垃圾及废弃物被丢在居住地附近,啮齿类及昆虫滋生,危害人类的野生动物亦在周围徘徊。再者,天花、麻疹、霍乱及其他的传染病亦容易发生。可以说,对于人类,定居生活并不是只有好的一面的。不难看出,史前的狩猎民与如今的狩猎采集民一样,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史前的狩猎采集民比起同时代的初期农耕民来,其生活要舒适得多。这有利于我们避免简单化理解农业起源问题。

尚民杰在《对早期原始农业的初步探索》(载《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是出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及人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他认为,仅靠采集得到的天然食物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为了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或是为了向牲畜提供饲料,在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发达、定居生活已出现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了种植业。也有学者认为,定居生活的出现不是原始种植业或是农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定居生活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在中美洲考古学上便有人们在有意地种植粮食作物很长时间之后,仍逐水草而居的记载。

4. 原始农业产生的时间

徐旺生在《农业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载《古今农业》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大约在距今10 000多年前,更新世冰川期还未退却,因不能将种植和

驯养活动持续下去,只能短暂地进行,从而种植和驯养行为不能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衣食的来源。到了距今 10 000 年左右,冰川期退却,气温上升,气候变暖,植物茂盛,动物大量繁殖,越过冰川期的人们有条件将剩余的采集种子贮藏起来以待适时种植,将捕获的野兽拘系起来从事驯养活动。经过长时间持续的努力,又由于定居的需要,人们生活中衣食来源更多地依赖这种种植和驯养活动,农耕和畜养便由此产生。

陆庭恩在《关于非洲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载《北大史学》2003 年第 1 期)一文中指出,农业产生前的漫长时间里人类都是依靠采集、狩猎或采集结合狩猎来获取生存资料。约在 10 000 年前,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农业出现,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学者们一直认为,从全球来说,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它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陈文华在《农业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 20 页)一书中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在许多距今 15 000—10 000 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川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人类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蚌、螺以及野生谷物通通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川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汤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杨雅婷译,中国: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页)一书中认为,现代人类的祖先大约在 450 万年前与猿猴分道扬镳,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则出现在 15 万年前左右,这时人类全部都是狩猎者,靠在荒野中猎捕动物、采集植物为生。直到 11 000 年前,人类才开始刻意栽培或养殖食物。农牧在世界的好几个不同地区出现,彼此并无关联;而它们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时间,在近东地区是公元前 8500 年左右,在中国是公元前 7500 年左右,在中南美洲是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从这三个主要起点开始,农牧技术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人类生产粮食的主要方法。

尽管我们承认,在距今 11 000 年左右,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和食物生产,但是也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 年,第 83 页)所言,农业的产生需要适合的多种条件,植物的驯化,即使在现在,农业也只能发生于那些易于获得可驯化植物的地方。气候的强烈变化,完全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平衡。当时的人,很好地应用了他们早已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种植了他们自己需要的食物。人类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曾经用许多种动植物进行了无数次的驯化实践,但只有在几个较适宜的地方,他们能够使驯化的动植物生产不断增长,并最终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使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这就是人们常称的所谓“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最初只在少数几个中心发生,最后才以食物生产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开来,传播全世界。

安德森在《中国食物》(马嫫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0 页)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步是决定种植和培育食物。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为其需要和欲望

找到了充足的食物。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农业的起源与传播》(李群译,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农业的发现,不是像公元前的阿基米德发现王冠所含纯金测量法那样突然。事实上,植物生长的机理,人类在农业革命之前就有所认识,就像在哥伦布航海探险之前,人们就较广泛地知道地球是圆的情况一样。有人已经证实,目前完全没有农业的未开化少数民族,他们对自己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变化是完全熟悉的。他们知道植物是由种子萌发生长的,这些植物通常需要水和阳光,它们在一种土壤上比在另一些土壤上生长得更好。这种知识很自然和不可避免地被原始人获得,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依靠他们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观察。没有什么理由可怀疑,而有许多可信的资料表明,在同样环境条件下的史前人类也已获得了同样的认识。

5. 原始农业产生的地域

陆庭恩在《关于非洲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载《北大史学》2003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农业的起源,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多元的。许多人认为西亚、东亚和中美洲三个地区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三大中心。农业在西亚地区的最早起源大概不晚于公元前8000年,在公元前6000年成为该地区人民的主要生存方式。那时,在今约旦河谷和伊拉克东北部的丘陵地带已出现较发达的农业村落。公元前5000年前后,东亚和中美洲地区农业也得以传播开来。就上述三个中心栽培的植物来说,小麦、大麦、水稻、小米、亚麻、玉米、马铃薯、蔬菜和某些水果等,就属于最早的一批农作物。在有的地区,山羊、绵羊、猪、狗等是早期驯养的家畜。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第85—90页)一书中认为,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其产量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依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原始农业在不同地区栽培的作物有较大的差异,大体说来,有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斯塔夫里阿诺斯还确信,中东和中美洲是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根据研究,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人们还推测,在亚洲的东南部、非洲的西部和南美的安第斯山脉,也可能有类似的中心。中东和中美洲是两个具有独特特征的地方,似乎反映了它们必定优先起源农业的法则。

陈玘在《非洲农业起源和传播的路线与过程》(载《华夏考古》2013年第1期)一文在分析非洲农业具备的条件之后,将非洲农业的起源划分为尼罗河流域和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北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稀树大草原区、热带雨林边缘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南非高原区等五个区域。非洲农业起源于本地,而不是从外界传播来的。它和西亚、东亚、中美洲一样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

李继东在《非洲农业的起源和贡献》(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非洲农